



《吕氏春秋》 对社会秩序的 理解与构建

● 庞 慧 著

The Rational Social System: What Is, and How To Make I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吕氏春秋》 对社会秩序的 理解与构建

● 庞 慧 著

The Rational Social System: What Is, and How To Make I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氏春秋》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与构建 / 庞慧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004 - 7650 - 4

I. 吕… II. 庞… III. ①吕氏春秋 - 研究②公共秩序 -
研究 - 中国 IV. B229. 25 D631. 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5946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吕氏春秋〉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与构建》一书即将出版，作者庞慧女弟嘱我写一篇序。因为这本书是在她的同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订而成的，我作为她的导师（和我一同指导她的导师还有蒋重跃教授），对于此书的内容是了解的，因此有条件也有义务为之作序。既然决定写序，那么又该写一些什么才比较恰当呢？这个问题，倒让我徘徊踌躇了好几天。

为什么呢？为他人的书作序，其内容无非一是介绍其书，一是介绍其人；甚至根据具体情况只介绍其某一方面，或者侧重某一方面，亦皆无可。本来就没有什么难处。例如，要谈此书的成绩，从答辩会后的记录数据就可以看到这样文字：

这篇论文在送审和答辩时，五位评审专家、七位答辩委员都给予了很高评价。答辩委员会称许本文的研究“相当深入”，尤其赞赏本文“对先秦、秦汉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有透彻、独到的理解”，认为本文“是一篇有新见的，有相当学术和理论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

这些专家的基本一致的评议，应该是可以说明此书底本的总体水平的。当然，对于任何一件学术成果，学者们往往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有不同意见不仅毫不奇怪，而且往往也是有助于学术自身的进展的。专家和读者诸君如能惠予批评指教，那么作者以至曾经指导作者的我，都是应该感谢的。

此书的具体内容，读者诸君是可以从书的本身清楚地得到了解的。因此这里不拟多说。我想着重说明的是，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是如何潜心努力研究的。

作者在陕西师范大学修硕士学位时，曾受业于赵世超、臧振诸先生之门，故学风淳朴，学有根底。来北京师范大学后上我所讲“中国古典研读和考证方法”课时，她听得很专心，然而发问不多，我觉得有些疑惑，就提问题问她，结果不论是小学还是目录问题，她都能很好地作出回答。我发现她是认真作了课前准备而且思想相当清晰的。不仅如此，她还用我所说的

方法尝试自己探讨问题，还曾经在重跃教授指导和鼓励下写出《‘类’与‘禴’祭》一文，使我更感到她的创发意识。她向重跃教授请教的时候甚多，重跃也常和我谈起她的好学与能力。我曾向重跃说，你比我更早、更好地发现了庞慧。她不仅听我的课，还听了许多其它先生所开的中外古史及有关史学理论的课，而且都颇得教益。我发现她是一个真正好学的人。不过她一直很低调，每次找我谈论文准备和写作时，几乎都会略带惶恐地表示自己作的还很不够。是的，学问哪有作到够了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时常不无惶恐地感到自己的不够的。

庞慧是虚心的，不过她并非没有信心和决心。她知道自己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她认真地分析汲取了前贤对《吕氏春秋》一书在版本流传中的编次与篇目流变的探讨与研究的成果，又比较系统地了解前贤对于《吕氏春秋》一书内容与思想探讨中的成果与问题。为此，她下了相当刻苦的工夫，而且也使自己的思想一直处于活跃的状态。在研究前贤研究成果的同时，她又认真地系统、反复研读《吕氏春秋》原书。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看来庞慧是懂得了这个道理，并能努力避免的。

在我看来，庞慧的这一本书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大思考。她曾长期深思，《吕氏春秋》作为被历来学者视为杂家，其内部是否有其自身的结构，也和我作过若干次讨论；后来她终于明白了，所谓“杂”，也就是先秦各家之杂，而先秦诸子的思想原来就是在相反相成之中发展的，因此先秦百家之学本来就在同一语境系统之中，所以《吕氏春秋》即使作为杂家也是可以有其自己的结构或系统的。这样，她就体会到了，《吕氏春秋》的思想既有其内在的结构，又有其外在的环境结构，而且这样的内外结构是既有区分又有联系的。这是她的这一本书中的横向的思考，可以说是其重大思考之一。庞慧又注意到了《吕氏春秋》成书于先秦与秦汉之交，自然就反复思考它的前因与后果的问题；虽然她更多地注意到的是其前因，而后果为量过大难以在短短三年之中完成，但是她能把《吕氏春秋》置于历史中来看，或者说能作纵向的历史思考，可以说是其重大思考之二。

我为庞慧此书写序，说的竟然主要是她在北京学习时给我留下的主要记忆和印象，似乎有些离题。不过，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孟子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原来他是在说，一个“善士”自然会与本地的善士交友，还会与本国的以至天下的善士交友；可是仍然觉得与当代之善士交友不足，于是更尚友古人。怎样才能与古人交友

呢？只有读其书。可是读其书不知其人，还是不能真正作到思想交流。因此读其书，必知其人。庞慧当然是今人，不过今人之间的直接学术交流也并不易；所以读今人之书还是一种最方便的学术交流途径。既然要读其书，那么知其人就仍然有其需要。我写这一篇序，也许可以从这个方面有便于此书的读者。

刘家和

2009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寓庐愚厂

目 录

绪言	(1)
一 传世本《吕氏春秋》与初本的一致性问题	(3)
1. 今本编次与初本是否一致	(3)
2. 今本内容与初本是否一致	(6)
二 《吕氏春秋》思想研究现状	(9)
1. 《吕氏春秋》思想研究历程与现状概说	(9)
2. 当前《吕氏春秋》思想研究中尚待深入的问题	(14)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21)

上篇 《吕氏春秋》的编撰与结构

第一章 《吕氏春秋》的编撰与成书	(29)
一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30)
二 编撰群体与编撰方式	(37)
三 《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	(41)
1. 《吕氏春秋》成书于哪一年	(41)
2. 《吕氏春秋》是否一次成书	(45)
第二章 十二纪、八览、六论的构成与含义	(49)
一 十二纪结构分析	(50)
1. 十二纪内在体系的统一性与矛盾性	(50)
2. 十二纪纪首之外四十八篇编次分析	(54)
3. 如何理解十二纪内在体系的矛盾性	(55)
二 八览结构分析	(57)
1. 《有始》与《有始览》	(58)
2. 八览的内容与层次	(62)
三 六论的内容与结构	(65)
1. 六论的内容与层次	(65)

2. 六论编次之义	(68)
四 《吕氏春秋》数字形式之寓意	(69)
1. 问题的由来	(69)
2. 12×5 之寓意	(71)
3. 8×8 之寓意	(74)
4. 6×6 之寓意	(76)
5. 如何理解《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	(79)
五 览事论理、顺天之纪——《吕氏春秋》三大部分的构成与含义	(84)
下篇 《吕氏春秋》中的君臣民及其相互关系	
引言	(91)
第一章 字义辨析	(97)
一 关于“君”、“臣”、“民”、“士”、“人”	(97)
二 “君”形象的历史演变与战国后期语境中的“君”	(102)
三 诸子著作中的“君”	(108)
第二章 《吕氏春秋》中的君主形象	(120)
一 《吕氏春秋》中的“君”与“主”	(120)
1. 《吕氏春秋》中“君”字的用法	(120)
2. 《吕氏春秋》是否主张多级君主制	(122)
3. 关于《吕氏春秋》中的“千乘”	(128)
4. “主”与“君”	(132)
5. 几点认识	(133)
二 理想的君主	(136)
1. 《吕氏春秋》对君主的品评区分	(136)
2. 《吕氏春秋》中的“贤主”	(143)
第三章 君守何道	(152)
一 何谓君道	(152)
二 利而勿利	(157)
三 用非其有	(163)

第四章 臣与君臣关系	(171)
一 《吕氏春秋》中的“贤者”	(171)
1. 理想的臣：“贤者”、“士”	(171)
2. 何为“贤者”：超越学派纷争的宽宏态度	(174)
3. 《吕氏春秋》对“贤”的理解	(178)
二 基于“一体”“分职”认识的君臣和同	(189)
1. 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君臣和同	(189)
2. 基于“一体”“分职”认识的君臣和同	(196)
三 君臣关系：理想与现实之际	(203)
第五章 民与君民关系	(211)
一 民是群氓	(211)
二 民是与天同气的群氓	(215)
三 民本与君本：循环的逻辑	(220)
第六章 如何看待《吕氏春秋》对君臣民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225)
一 总体上的统一	(225)
二 理解和解说中的内在冲突	(226)
三 与诸子之说的比较	(230)
结语	(240)
一 如何看待《吕氏春秋》思想及其出现	(240)
二 战国后期的政治走向与《吕氏春秋》的出现	(250)
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67)

绪 言

本书讨论《吕氏春秋》的总体思想。采用“《吕氏春秋》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与构建”这样一个名称，并非有意立异，而是在在我看来，这正是《吕氏春秋》表达其思想的形式和特色所在。

《吕氏春秋》，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撰的一部旨在统一诸子治道之作。是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形式上严整统一，但在内容上广泛吸纳各家成说，显得驳杂不纯，要把握其总体思想并非易事。因而如何根据此书内容、特点，选取合适的切入角度，是本论题能否成立的重要前提。《吕氏春秋》是一部融汇诸子治道之作，它融汇诸子的目的，是要统一思想，令“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①，为即将到来的天下之君提供一个法天则地本于人的政治方案，以构建最为合理的社会秩序^②。政治思想，是《吕氏春秋》全书的主题和命意所在，而《吕氏春秋》讨论政治思想，又自始至终围绕着构建合理社会秩序这一中心展开。因此从《吕氏春秋》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与构建入手，当是探究此书总体思想的理想角度。而从这一角度出发，《吕氏春秋》对诸子之言的融汇与折中，便可以判然析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形式上，将诸子有关治道的讨论拆分、拼接、改写成许多专论，然后按一定的顺序排列组合起来；第二个层次，是在内容上，对诸子之说进行取舍、调和、折中，使其能够大致统一起来。那么，根据《吕氏春秋》自身的理路，考察它是如何融汇诸子之言？它是否有比较统一、一贯的主张？如果有，这主张有无理论依据？依据是什么？将这些问题放在文本中，通过与各家之说的比较，一一细细梳理，寻得其解答。在此基础之

^① 《吕氏春秋·序意》语。

^② 很多学者都谈到了这一点。（元）陈澧称吕不韦作此书“将欲为一代兴王典礼”（《礼记集说》卷三），牟钟鉴认为“《吕氏春秋》应当算作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部最完整的治国法典”（《〈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3页），王利器认为“六论、十二纪，吕不韦之帝秦策也”（《吕氏春秋注疏》序，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8页），虽然具体表述内容或有异，但看法基本相同。即使没有这样说过的学者，也都认为《吕氏春秋》的主题是讨论治国之道。在这一点上，学界无异议。

上，在战国秦汉学术与政治的分合变迁中，考察是什么样的知识（学术）背景，促成了《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又是什么样的政治实践造就了《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经过这样一番工作之后，我们应该可以对《吕氏春秋》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得出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进而也便可以对《吕氏春秋》是否杂家著作、历史上有无杂家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当然，形式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实质上的一致，《吕氏春秋》的思想是否已经统一成了一个整体，乃是本文探求的目的，而非立论的前提。这是首先要予以说明的。不过，《吕氏春秋》是否具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与它是否具有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其间并没有必然关系。从世界文化的背景来看，先秦诸子共处于一个话语系统之中，各家思想本身便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而百家争鸣，诸子在互相批评中也在互相吸收、互相渗透。这正是后来的汉帝国能在兼容百家的气度下统一思想的根本原因。《吕氏春秋》作为秦相吕不韦在其权力巅峰时期组织门客编写成的综合诸子治道之作，它的出现一方面可说是体现了战国后期百家之说在长期争鸣过程中互相吸收、走向综合这种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其时发展中的政治力量试图控制学术、统一思想的努力，而这正预示了日后大一统帝国里政治、学术关系的基本格局。可以这样说，《吕氏春秋》在思想史上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少独创的思想或精深的哲理，而在于它统一诸子思想的努力及其具体做法。正是这一点，使它能够上承战国百家争鸣的余绪，下启秦汉学术政治化的先河，成为沟通两个时代的思想桥梁^①。简言之，研究《吕氏春秋》的思想，应当以战国秦汉间学术与政治的流变转移为参照系，而对《吕氏春秋》思想的研究，也应当能够提升当前学界对战国秦汉历史文化的认识。本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取径，即本于此。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先对下述几个问题进行简要说明：第一，传世本《吕氏春秋》与初本的一致性问题；第二，《吕氏春秋》思想研究的现状；第三，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① 在当代各种哲学、思想类的通史著作中，《吕氏春秋》或被置于先秦之末，作为诸子时代的终篇；或被列在两汉之首，视为经学时代的开端。前者如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后者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这可以说明《吕氏春秋》思想具有鲜明的过渡色彩。

一 传世本《吕氏春秋》与初本的一致性问题的

《吕氏春秋》一书，《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了其成书经过及全书结构、卷数，这是目前所知除本书以外有关《吕氏春秋》著录情况的最早记载。之后，在《汉书·艺文志》以下的历代目录志中，《吕氏春秋》从未缺载，表明流传没有中断^①；历代学人也屡屡称引此书，证明其书传习未衰^②。因而历代学人考此书，皆以其书为确有。不过，《吕氏春秋》在著录、流传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故清以后学人，虽然都相信此书为真，但像梁启超那样乐观地认为“此书经二千年，无残缺、无窜乱”^③者并不多见，很多学者认为今本《吕氏春秋》与当年司马迁所见本已经不尽一致，不过，对于究竟哪些地方“不一致”，“不一致”的程度如何，则有不同意见。而司马迁所见本是否就是当年陈列于咸阳市门之本，也还存在不同看法。争议集中在这样两个问题上：其一，今本《吕氏春秋》编次与初本是否一致？其二，今本《吕氏春秋》各篇内容与初本是否一致？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更因而引发对《吕氏春秋》是否一次成书，《吕氏春秋》的书名是《吕氏春秋》还是《吕览》等的争论。其间虽不乏认真的探讨，但也存在专意立异、以新说自高的倾向。

1. 今本编次与初本是否一致

今本《吕氏春秋》各部分的序次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但在《史

① 《汉书·艺文志》“子”类“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隋书·经籍志》三“子部”“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吕不韦撰，高诱注”；《旧唐书·经籍志》下“丙部子录”“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吕不韦撰”；《新唐书·艺文志》三“丙部子录”“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吕不韦撰，高诱注”；《宋史·艺文志》“子类”“杂家”：“吕不韦《吕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诱注”。

以上所举仅为历代正史所载，代表的是官方藏书情况。宋以后，私家藏书兴盛，如陈振孙、晁公武、高似孙在其书录里都提到了《吕氏春秋》，表明此书在民间也有流传。到明代，《吕氏春秋》在民间的流传更为广泛，出现了众多的刻本、校本，今存者尚有10余种，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等处。

② 举其大略，除众所周知的司马迁、高诱、魏征、马总等人必然读过《吕氏春秋》外，余如西汉的扬雄、东汉的许慎、王充，南北朝时北朝的刘勰、南朝的裴骈，唐代的刘知几、司马贞，北宋的苏轼、苏辙，南宋的陆游、王应麟等，都曾在其著作中谈到或引用过《吕氏春秋》。至于元明以下，则有《吕氏春秋》旧刻尚存于世。

③ 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载《饮冰室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

记》吕不韦本传及《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吕氏春秋》三大部分的排列顺序却是八览、六论、十二纪，与今本不合，因而有学者认为今本此书序次可能经过后人颠倒，其初本当如《史记》所记，以八览居首。

较早提出《吕氏春秋》各部分序次可能曾经改变的学者是清代的梁玉绳。乾隆年间，梁氏在初校此书时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及吕不韦传并云著八览、六论、十二纪，以纪居末，故世称《吕览》，举其居首者言之。今《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首，似非本书序次。”^①梁氏之后，如张心澄、吕思勉、郭沫若、杨树达、牟钟鉴等众多学者都提出《吕氏春秋》初本当以八览居首。除了梁氏所列的那两点理由外，这些学者还以《序意》在十二纪之后，而“古书自序，例在篇末”，证此书初本应是十二纪居末^②。

不过，还有相当多的学者，如毕沅、刘咸炘、王范之、徐复观等坚持认为《吕氏春秋》编次自成书以来并无改变。这些学者举出的理由是：《吕氏春秋》命名之义，取自十二纪；“十二纪乃全书大旨所在”，应居前；《序意》篇“先述十二纪，是十二纪居首明矣”^③。又有学者以“秦人尚六数”，提出《吕氏春秋》初本序次“本为六论、十二纪、八览”^④。

考察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意见难以统一的原因，主要是对《吕氏春秋》以“春秋”命名之意的理解不同。主张十二纪居首的学者，认为“春秋”之名得自于十二纪纪首，有纪时立政之意味。而主张八览居首的学者，则多从史意、史法等角度来解说“春秋”之意，称《吕氏春秋》一书多引史事，故号“春秋”。揆之史实，我们知道“春秋”一词的这两种寓意并非水火不容，至少在《吕氏春秋》成书的时代，“春秋”的这两种寓意都已被时人接

① 梁氏后来不知何故放弃了此说。详见毕沅校正本《吕氏春秋》书前高诱序下毕沅按语。

② 详见张心澄《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39年本，第839页）；吕思勉《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7页）；杨树达《读吕氏春秋书后》（《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5页）；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9—11页）。

③ 详见毕沅校正本《吕氏春秋》书前高诱序下毕沅按语；另详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④ 王利器说。详见氏著《吕氏春秋注疏》序之第二部分。

受、认可^①。因此《吕氏春秋》以“春秋”名书，更可能是将这两种寓意都考虑到了，如果一定要限定“春秋”一词的何种寓意才是《吕氏春秋》命名之义，恐怕反而徒生滋扰。在这个问题上，杨树达、牟钟鉴的意见，可能最具启发性。二位在列举了上面所提到的关于八览居首的那几条理由之后，更从秦汉思想观念的演变来看待今本《吕氏春秋》编次的形成。杨树达谓：“自汉人取十二纪为《月令》，小戴氏采之以为《礼记》，而《小戴记》在后世列于经典，十二纪之先置，其殆由后世儒生尊经之故乎！”^②牟钟鉴更证以两汉时代精神的流变，说明改变《吕氏春秋》原本编次的当为汉人，高诱所见本的编次已经跟今本一样了^③。

参较众说，杨树达等人所主张的《吕氏春秋》初本应以八览居首的说法，确实是到目前为止最有依据、最合情理之说。不过，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既在于寻求可靠的外部证据，如《史记》等早期文献的记述，更需要通过对此书内容的寻绎案省，从其自身的内在理路中推寻其编次之义。在这方面，虽已有学者做过一些工作，但还有很多问题尚待厘清。

从历代有关《吕氏春秋》一书编次的著录情况来看，今本十二纪、八览、六论之次第相沿已久。东汉末年高诱作《吕氏春秋训解》，书前之序，叙及此书之由来，而称：“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④所叙《吕氏春秋》各部分之次第与今本同。高诱之后，唐、宋以来学者提到《吕氏春秋》，都以纪、览、论为次。如唐马总《意林》称吕不韦集儒士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与今本序次同。在宋代至有学者从《吕氏春秋》的编次出发，探讨其命名之义。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杂类》本李淑之说，以为“是

① 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记鲁哀公问孔子：“《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霁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这是以《春秋》有纪时立政之意。《庄子·天下》篇称“《春秋》以道名分”，这是就史义言。

② 杨树达：《读〈吕氏春秋〉书后》，《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6页。

③ 牟氏言：“自董仲舒以后，儒家与阴阳五行相糅合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天与人相感，五行与四时相配，成为多数儒家学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东汉，此风最盛。在这些人看来，《吕氏春秋》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十二纪，十二纪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各纪的纪首，于是十二纪就在这强烈的偏爱气氛中被提到全书之首了。”详见《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9—11页。

④ 高诱训解，毕沅等校正《吕氏春秋》，《诸子集成》本第六册，本书第2页。

书以月纪为首，故以春秋名”^①。如果《吕氏春秋》一书编次确曾在历史上发生改变，那么，这改变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高诱之前，估计是在两汉之时。牟钟鉴先生以为是东汉诸儒所为，或有可能。《吕氏春秋》最初是写在竹简上的，这从《汉书·艺文志》所记“《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可以推知。那么，汉人所见的《吕氏春秋》一书，便是这二十六捆竹简，其在存放、阅读过程中次第发生变化，是极有可能的。汉代诸儒，极重天人之道。《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纪首，与《礼记》中的《月令》出自同一篇文字，而《月令》在汉代享有法典般的权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里，十二纪较之八览六论更受重视，乃是理所当然。因而汉儒在阅读、整理《吕氏春秋》时，将十二纪提至全书之首，是可以理解的。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不少先秦古书早期流传本的编排次第与今本并不一致，比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相反。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篇，各章次第与今本《礼记》中的《缁衣》篇亦有差别。这说明汉儒整理先秦文献而改变原书编次的做法并不鲜见。

关于《吕氏春秋》一书编次，还有一类意见，近年比较流行。这类意见认为《吕氏春秋》并不是一次成书，而是分批编成，然后（在司马迁之前）才汇集成书。这类意见的出现，最初本来是想调和各种关于览、纪孰当居首的争论，为《史记》对《吕氏春秋》各部分次第和书名的记载与今本不太一致的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不料解释后来又演成立论的前提，遂牵涉到对《吕氏春秋》成书年代、书名、著书宗旨等问题的争论。对于这类意见，留待下文讨论《吕氏春秋》的编撰与成书问题时再详细介绍。

2. 今本内容与初本是否一致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因传抄、翻刻致误。《吕氏春秋》虽是先秦古书中“最完好而易读者”^②，但零星的错简、衍缺、讹误还是不少，甚至整篇的脱佚窜乱，也可能存在。清卢文弨于《抱经堂文集》中云：“此书一百六十篇，与历代著录同，然《序意》旧不入数，则尚少一篇。此书分篇极为整齐，十二纪各五篇，六论论各六篇、八览览当各八篇。今第一览止七

^① 王氏此书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史记两汉书三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按：《礼记·礼运》篇郑玄注有云：“《吕氏》说月令而谓之春秋，事类相近焉。”此说是王氏所本。郑注虽然没有明说《吕氏春秋》以十二纪居首，但可以导向此种理解。后来主张《吕》初本以十二纪为首的学者，多引此语为证。

^② 梁启超语，见氏著《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载《饮冰室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

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纪之义，乃末忽载豫让一事，与《序意》不类，且旧校本云：‘一作《廉孝》’，与此篇更无涉，即豫让亦难专有其名，因疑《序意》之后半篇俄空焉，别有所谓‘廉孝’者，其前半篇亦脱简，后人遂强相附合，并《序意》为一篇，以补总数之缺，然《序意》首无‘六曰’二字，后人于目中专辄加之，以求合其数，而不知其迹有难掩也。”^① 洪亮吉、梁玉绳、孙锵鸣、陈奇猷等认为《序意》篇末所载豫让之事，当属上篇《不侵》之文，错简在此^②。然不论是否同意卢氏之说，《序意》篇肯定有残缺、有窜乱，而《有始览》少一篇，则是大家承认的。除《序意》篇外，或据《不二》等篇篇幅特短，疑其有残缺^③，或因《诬徒》、《用众》篇内容有重合，疑其有错简^④。这类议论不少，但多是度以己意，并无其他证据，难以成立。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辟专节记述历代学人对《吕氏春秋》书中的佚文、错简的指认与辨析，可以看出其中因理解分歧而以不误为误的例子甚多^⑤。陈奇猷曾将诸书所引《吕氏春秋》佚文共38条，集为一帙，附在所著《吕氏春秋新校释》之后。这38条佚文经陈先生“仔细审核”，发现“多为引他书而误作《吕氏》，或引者援《吕》意改作”。陈称辑此不过“姑存之，以供参考尔”^⑥。这似可说明今本《吕氏春秋》脱佚衍伪的情况并不严重。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涉及《吕氏春秋》初本字数多少的争论。关于《吕氏春秋》全本字数，司马迁、高诱说法不一。《史记·吕不韦列传》称是书“二十余万言”，但《文选·报任少卿书》注引《史记》，则作“三十余万言”。高诱《训解》序称：“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这句话中的“合”字，元明人本作“各”，毕沅校正本仍作“各”^⑦，蒋维乔等据《御览》六〇二引文更正，陈奇猷从之^⑧。但仍有当代学者认为元明人本此字不误，如施之勉引高诱此语，便仍用“各”字，并申其义：“十二纪八览六论各十余万言，则

① 转引自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0页。

② 同上书，第660—661页。

③ 同上书，第1141页。

④ 参见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95—96页。

⑤ 同上书，第93—110页。

⑥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第1818页。

⑦ 见《吕氏春秋》，《诸子集成》本第六册，第2页。

⑧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第2页。

《吕氏春秋》三十余万言矣。”施氏认为《吕氏春秋》初本字数“则二十余万言，或三十余万言”^①。元明以后传世本《吕氏春秋》的字数，据一些学者点算，明刘如宠本共计十万零一百二十九字^②，清毕沅本共十万零四字^③。如据施氏所言，则今本《吕氏春秋》已残缺大半。但今本此书卷目整齐，除少数篇章篇幅极短，似有残缺外，各篇基本上首尾完具，字数大多在七百至一千字之间，实在看不出有多少残缺的痕迹。故当前学界多数认为《史记》所记此书字数，或系司马迁误计，或系传抄致误，不可为据，而高诱所说的《吕氏春秋》三部分字数，当是“合十余万言”，与今本的误差不大。

《吕氏春秋》在汉代已出现了因传写致误的情况，高诱正是因为此书“既有脱误，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犹虑传义失其本真”，才“复依先师旧训，辄乃为之解焉”^④。而此书在后世流传过程中，高诱注本身也出现了脱误。大致而言，《吕氏春秋》在中唐以前还较受学人重视，故在先秦诸子著作纷纷失传的汉魏南北朝时代，此书能基本不失原样地流传下来。不过其时书籍传写不便，容易因抄写致误。宋代印刷术大行于世，但宋代却是《吕氏春秋》在历史上最受轻视的时期，就在这一时期，《吕氏春秋》读者甚少，民间流传本甚至脱缺三十篇左右^⑤。元时，《吕氏春秋》稍行于世。明代文人甚重此书，其时出现了一些较好的校本或版本，但明人于考证、校勘之道并不熟练，且常有改字过勇的毛病，因此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增加了一些混乱。直到清代，毕沅校正本才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大致恢复了高诱注本的原貌。此后，许维遹、蒋维乔、陈奇猷等又续有改进。要言之，今天所见的《吕氏春秋》，确实存在着一些文字上的衍脱窜伪和个别篇章上的残缺窜乱现象，但这种现象并未严重到会影响人们对《吕氏春秋》一书的正确理解。而且，经过明、清两代及20世纪许多学者的努力，这个问题能解决的部分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如果说我们今天

① 施之勉：《〈吕氏春秋〉二十余万言或三十余万言》，《大陆杂志》1969年第9期。

② 谭戒甫：《校吕遗谊》引其友罗峻语，转引自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③ 贺凌虚统计。引自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④ 语见高诱《〈吕氏春秋〉训解》序。

⑤ 参见毕沅校正本《吕氏春秋》书后所附《镜湖遗老手校记》，文曰：“余杭夔本亡三十篇，而脱句漏字合三万余言”，见是书第346页。据“校记”，此镜湖遗老为北宋元祐年间人，然生平、姓字不详。明凌稚隆曾推测此人是两宋之际的大诗人陆游，清儒王念孙认为当是北宋词人贺铸，今人多从王说。